全球對話 5.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4期，以15種語言刊出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國社會學的危機

Ivan Szelenyi

全球社會學？

Gurminder Bhambra

我們想要的未來

Markus S. Schulz

查理週刊事件之後

Stéphane Beaud,
Mabel Berezin,
Elisabeth Becker

全球論壇

> 巴基斯坦的社會學

> 紀念Ulrich Beck

> 愛爾蘭的社會學

GD
第5卷 / 第 2期 /2015.6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 主編的話

社會學的未來和未來的社會學

這期全球對話展開了新的系列文章：社會學的未來。著名的匈牙利社會學家 Ivan Szelenyi 提出了美國社會學面臨三重危機的觀點：政治危機、方法危機、理論危機。美國社會學已經失去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到達巔峰的政治上的召喚能力，而且在方法論上也失去優勢，沒辦法和政治學與經濟學中流行的田野實驗與因果分析並駕齊驅，此外也失去了理論的想像力，與古典社會學脫鉤。他指出，美國社會學越來越不受到學生歡迎，這是真的嗎？

英國的 Gurminder Bhambra 批判社會學不成比例地把重點放在全球北方，例如 Szelenyi 的研究，但也批判本土社會學、全球世界主義、現代化理論，因為其以歐中作為中心出發，作為其他地方的參考基準。這些觀點沒有辦法達到她所提出的全球社會學任務：透過連結去重新找回殖民和後殖民的經驗。然而，全球社會學可以沒有南方的參與嗎？另外兩位從巴基斯坦來的社會學家 Laila Bushra 和 Hassan Javid 描述了許多南方國家的社會學所面臨的困難，遑論全球社會學。這是真實的，即使巴基斯坦有著國家層級的社會學會和 19 位 ISA 的會員。

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南方在北方的深化。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Stéphane Beaud 描述了法國社會學家的辯論，而 Mabel Berezin 說明了歐洲右翼政治的轉變。Elisabeth Becker 則以她在德國、西班牙、英國的田野經驗，說明了在穆斯林社群蔓延的恐懼。

ISA 的研究副會長 Markus Schulz 討論了從社會學的未來到未來社會學，這是 2016 年 7 月 10-14 日在 Vienna 舉辦的 ISA Forum 的主題。他從說明診斷未來的重要性開始，並且警示了危險的到來。未來掌握在人類手中，社會學則應該找到自己的位置。Schulz 的視野是被 Ulrich Beck 所啟發的。Ulrich Beck 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去世，這是全球社會學社群的損失。他是影響深遠的社會學家，啟發無數的人，並且超越了學科疆界。這期全球對話也從德國、阿根廷、南韓、加拿大的學者的角度撰文紀念 Ulrich Beck。

最後，我們繼續了我們各個國家社會學的系列文章。這期是愛爾蘭。有四篇文章描述了愛爾蘭的全球轉變：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復興的公共領域，愛爾蘭家庭的全球化，以及歐洲對愛爾蘭女性運動的支持的啟示。

全球對話以 15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Ivan Szelenyi 是傑出的匈牙利社會學家，以自身經驗出發，討論美國社會學的衰落。

Gurminder Bhambra是英國的著名社會學家，批判全球社會學的傳統取徑，提出「連結社會學」的理論。

Markus Schulz是ISA的研究副會長。他介紹了2016年7月10-14日在Vienna舉辦的ISA Forum的主題：我們想要的未來—全球社會學與邁向更好的未來。

GD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Pragya Sharma,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itra Daneshvar, Faezeh Khajeh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Hikari Kubota, Hatsuna Kurosawa, Masahiro Matsuda, Yuka Mitani, Ayaka Ogura, Hirotaka Omatsu, Fuma Sekiguchi.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Gulim Dosanova, Daurenbek Kuleimenov, Elmira Otar, Ramazan Salykzhanov, Adil Rodionov, Nurlan Baygabyl, Gani Madi, Anar Bilimbayeva, Galimzhanova Zhulduz.

波蘭:
Adam Müller, Anna Wandzel, Jakub Barszczewski, Justyna Kościńska, Justyna Zielińska, Kamil Lipiń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Mariusz Finkielsztajn, Martyna Maciuch, Mikołaj Mierzejewski, Patrycja Pendrakowska, Weronika Gawarska, Zofi a Penza.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Corina Brăgaru, Andreea Acasandre, Ramona Cantaragiu, Alexandru Dutu, Ruxandra Iordache, Mihai-Bogdan Marian, Angelica Marinescu, Anca Mihai, Monica Nădrag, Balazs Telegdy,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Nil Mit, Rana Çavuşoğlu.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社會學的未來和未來的社會學 2

美國社會學的三重危機
by Ivan Szelenyi, 匈牙利 4

全球社會學？
by Gurminder Bhambra, 英國 8

我們想要的未來
by Markus Schulz, 美國 11

> 查理週刊事件過後

法國社會學家辯論查理週刊事件
by Stéphane Beaud, 法國 13

查理週刊事件之後的極端主義政治
by Mabel Berezin, 美國 16

田野筆記：在歐洲體驗恐懼
by Elisabeth Becker, 德國 19

> 巴基斯坦社會學

搜尋巴基斯坦社會學
by Laila Bushra, 巴基斯坦 22

巴基斯坦社會學的展望
by Hassan Javid, 巴基斯坦 24

> 紀念Ulrich Beck

Ulrich Beck:**來自歐洲的世界主義社會學家**
by Klaus Dörre, 德國 26

Ulrich Beck**在拉丁美洲**
by Ana María Vara, 阿根廷 28

Ulrich Beck**在東亞的影響**
by Sang-Jin Han, 南韓 30

Ulrich Beck**在北美的多重影響**
by Fuyuki Kurasawa, 加拿大 32

> 愛爾蘭社會學

愛爾蘭的經濟危機
by Seán Ó Riain, 愛爾蘭 34

保衛公共領域
by Mary P. Corcoran, 愛爾蘭 36

愛爾蘭的女性運動
by Pauline Cullen, 愛爾蘭 38

Celtic連結：愛爾蘭的全球家庭
by Rebecca Chiyoko King-O'Riain, 愛爾蘭 40

> 美國社會學的危機

by Ivan Szelenyi, New York University, 美國

45年前，Alvin Gouldner在《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一書中，預測了Parsons結構功能論的消失，以及反身社會學的興起。這在1970年代看起來是剛好相反。因為1970年代Parsonse過世之後，社會學進入了最令人興奮的階段。而和Gouldner站在同一陣線的其他社會學家像是Seymour Martin Lipset, C. Wright Mills, S.M. Miller, Lee Rainwater, Pierre Bourdieu, David Lockwood, Ralph Miliband, Claus Offe, Ralf Dahrendorf，還有來自當時社會主義東歐的Praxis學派，都是批判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很諷刺的，Gouldner的預言好像不成立了，因為這個學科已經擺脫了結構功能論，找到了出路。這曾經是擁有無聊概念、無法驗證的學科，變成了政治和知識上令人興奮的課程。

Ivan Szelenyi.

Ivan Szelenyi是傑出的社會科學家，把社會學應到我們這個時代重要問題上面。他從1960年從匈牙利開始其職業生涯，一開始在匈牙利統計局和在科學院裡面工作，由於其批判的角度，最後被迫離開。批判的作品包括了和George Konrad合作的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1979)，是研究東歐社會主義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後來他到奧地利的Flinders University的社會系教書，後來又到美國，是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Graduate Center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和Yale University等學校的的講座教授。最近他是New York University之Abu Dhabi Campus的社會科學院院長。他的研究包括了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市場分配機制以及社會主義資本家的軌跡，至今仍然是相當有原創性的。他是少數幾位結合歷史與比較方法研究社會主義市場轉型的學者之一，與其學生Gil Eyal 和Eleanor Townsley等合著了《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他出版了許多包括研究後共產匈牙利的精英和窮人，也桃李滿天下，並且其社會理論的歷史課程相當受歡迎。很少人可以像他從美國內部和外部的角度評價美國社會學。

>>

Arbu.繪。

可是到了今天，Gouldner 的預言看起來又格外正確，因為社會科學已經產生了根本的改變。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實驗方法等取得了勝利。社會學家仍然尋找怎麼回應這個潮流。現在的學生比較保守，擔心就業和退休金，並且對激進理論喪失了興趣。社會學系所沒有辦法吸引足夠的學生去主修，只好提供輕薄短小的課程，好增加修課人數。[1]

社會學似乎面臨了三個危機。第一，社會學已經失去了其政治上的吸引力和激進的面向。第二，社會學還沒有找到對於從經濟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而來的方法論挑戰的適當回應。第三，社會學似乎在理論的核心這點上面讓人困惑 (例如，什麼是社會學的經典書籍)，甚至這樣的核心是否需要都成問題。

> 政治危機

四十年前，社會學是一個可以吸引激進老師和學生的學科，對於那些有興趣於改革甚至革命的人，社會學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而 19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社會學家通常比較保守，而學生都比較激進。

現在的情況剛好相反。我們有激進的老師，可是學生好像是「年輕共和黨人」。如果你支持共和黨，為什麼你會主修社會學而非經濟學或理性主義政治學呢？而我們的問題並不是我們不能找到足夠的座位給學生修課，而是不能找到足夠的學生來開課。

這就是我稱的「政治危機」：我們不能吸引學生，而社會學也不能提供社會改革有志之士願景。

> 方法論危機

但是社會學的危機反應了「方法論革命」。像是 Comte 所說的，期堅持「社會的科學」必須包括和自然科學相同的方法嚴謹度，社會科學家長期以來想要證成自己是「科學」，所以在「變數」之間建立「因果關係」。

而社會科學家可能找到因果關係嗎？韋伯很懷疑不能，但也提出「詮釋社會科學」。而社會學因為調查方法和 隨機抽樣 (用幾百人的樣本來預測幾百萬人的選舉結果) 有了很大的勝利，但是我們距離真正的因我關係還很遙遠。

要驗證因果關係，我們必須把部份的人歸類成「實驗組」，讓這些人接受否些「治療」，而其他是控制組，則沒有接受治療。

而和實驗相反的是，調查研究不可避免會面臨「選擇問題」，無法分辨 A 和 B 兩群人的差異是本來就有或是因為接受治療而產生的。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我們知道結婚的人活比較久，可是我們麼知道這是因為婚姻，或是健康的人比較可能結婚呢？如果

>>

我們可以把某些 40 歲的人道實驗組，其他到控制組，實驗組可以結婚，控制組則不能，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因果關係。可是這樣的隨機分配顯然不可行。

社會研究者已經開始要走出這個泥沼，試著去找出「因果機制」，說明 x 可能如何導致 y。例如，結婚者飲食規律，較少飲酒，可能活得比較久。這是很大的進步，我也在我們研究中嘗試了很多次，可是對於「常態科學家」來說，這行不太通。調查研究者試過了其他方法，不過都沒有解決選擇問題。

有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開始使用實驗。實驗若有著控制的環境，那麼隨機分配就可以得到解決，可是成本太高了，還有外部正確性的問題，就是是否實驗結果可以應用到實驗室以外。這個方法也沒有真正的隨機樣本，所以無法有普遍的理論，因為受試者都是中產階級大學生 (另外的方法是田野實驗，隨機選擇可以成立，可是隨機分類則無法進行)。

然而，經濟學和政治學提供了一套解決因果關係的方法論 (雖然我提到經驗上的問題)，社會學則處於防衛立場。所以，產生了方法論危機。

> 理論危機

社會學並沒有產出比較好的理論。從 1980 年之後，理論就一直衰退。我不是對於 Merton-Parsons 的理論有鄉愁，結構功能論後來被健康的理論對話所取代，主要是 Marx 和 Weber，但也有其他理論的空間，像是象徵互動論和民族誌方法。

我必須承認，即使在 60 和 70 的黃金年代，社會學家也在辯論什麼樣的作品必須納入社會學理論課程。現在共識可不可能，特別是為了保持一定的組成，社會學試著去吸引跨學科的領域，像是女性研究、黑人研究、亞裔研究、墨西哥裔研究，文化研究等等，這些都是有正當性的，可是卻會模糊了社會學的學科界線。

和經濟學與政治學的比較是有用的。經濟學家對於其理論的基礎是有共識的。我所認識的經濟學家都知道為什麼學生應該修總總體和個體經濟學。不過對於課程內容比較彈性的空間。可是課程大綱非常標準化，任何的經濟學博士都可以教這們課。不過對於古典理論的忽略是值得一提的，這意謂著學生很少辯論那些長期以來的爭議議題。古典理論爭議有可能會回到這個學科，就像是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機時的 Marx 和 Keynes 一樣。

相反的，許多社會學系所對於導論課程並沒有共識，所以提供了許多課程，理論和認識論都大不相同的課程，或是提供像是沙拉搬的導論課程，把幾個 sexy 的主題混合在一起，搭配一些電話簿目錄般的無聊基本概念。經濟學的模式比較好，或是社會學呢？我會回到這個問題，但是看得出來經濟學鞏固了學科，社會學則有點混亂。

更讓人困擾的是，社會學家對於經典有沒共識，所以對於什麼是社會學的基本問題也沒有共識。社會學可能對於什麼樣的問題是屬於社會學家的有些輪廓，像是不平等、教育和職業取得、社會流動。現在我們不但很難指出我們的研究問題是什麼，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甚至對上述這些問題也有很好的研究。我想社會學家對於現在最重要研究不平等的書籍是由經濟學家像是 Thomas Piketty 或 Joseph Stiglitz 所寫的感到慚愧了吧。

> 危機的出路？

讓我討論社會學方法的優點來結論這篇文章，並且呼籲那些想要模仿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社會學家們，這麼做是有危險的。

社會學的優點是反身性。從 Marx(「統治階級的思想存在於每一個統治的思想裡」) 到 Mannheim (「意見、宣稱、反對、思想系統，都是從表達者的角度所詮釋的」) 以及 Alvin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這些社會學家都問誰是言說者，而什麼樣的角色是社會學家扮演的？只要社會學家尋找無言者的聲音，他們就會找到其支持者。

是的，現在的學生或許比較保守，可是 2008-2009 年之後以已經產生了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不滿。當社會學回到階級、種族、性別、權力、貧窮、壓迫、剝削、偏見的問題，社會學的榮景將會再次出現。Michael Burawoy 的公共社會學呼籲就是這樣的召喚，而且他的社會系在這點相當傑出，教室總是作滿，並且有著最好的研究生。若社會

>>

學秉著政治的任務，其會重新奪回被經濟學所主導的大問題，也會找回 Marx 或 Weber 的批判社會學傳統。

對於方法論的危機，許多社會學家的解決方式是把社會學變成常態科學，便得更像經濟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公式化人類行為，而不是逼近社會現實。但是我已經指出，實驗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驗證因果假設，可是其對於新古典經濟學所面臨科學預測的問題是沒有幫助的。

在 NYU 的 Abu Dhabi 的教授 seminar 中，我們問了一個問題：經濟學是科學嗎？我的從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來的同事 Gilles Saint-Paul 說的好：若資料有缺點，而模型又不能被否證，那經濟學怎麼可能是科學？Gilles 建議，應該把經濟學看成是一種文化活動，提供辯論的框架，而非可否證的假設。

我承認我覺得「為什麼」的問題比「如何」的問題還要有意義，而且我也覺得無法否證的問題不是好的研究。可是像是 Weber 發明了「客觀性」一詞，我會把社會科學看成是複數的科學。若科學代表因果關係的可檢證性，這點上，沒有什麼社會科學是科學。從 Hobbes 和 Parsons 的觀點來說，社會行動是自願性的，而 agent 是可以做選擇的。像是 Marx 也精確觀察到「人類創造歷史，但是也被過去所影響。」人們做出選擇，而且選擇是統計性的，不是決定性的。Weber 說得好：我們可以詮釋性動，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分辨什麼行動是理性的，也沒辦法預測下一個行動。

從這個意義來說，詮釋社會學是優於理性選擇理論的，而社會學家也在模仿經濟學和政治學這點上犯了錯誤。

社會學還有另外一個優點，那就是社會學家用反身性來解讀資料。對於質化研究者來說更是如此。Howard Becker 所訓練出來的民族誌學者最了解這點：一個人必須完全進入一個社會情境中才可以知道什麼是可以問的社會學問題。細心的田野研究者和調查學者可以告訴我們對於社會現實該有多麼細心。

社會學若是接受自己是一種科學 (小寫) 而非大寫的科學，那麼社會學會更好。是的，我們應該問「為什麼」，但是還是要對於我們的答案抱持懷疑的態度。從這個觀點來說，經濟和政治學若從社會學學習這點的話，他們也會變得更好。

所以底限是什麼呢？社會學的確有三重危機，對於來自於新古典經濟學和理性選擇學派的科學的挑戰有著錯誤的回應，不是模仿他們，就是趕搭潮流，變得跨學科卻失去原本的支持者。

然而，我建議回到古典的 Marx 或是 Weber 的傳統，也就是探索大問題的傳統。新古典經濟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或許認為自己是科學，但是社會學若是也模仿他們，變成另外一個常態科學，那會變得很愚蠢。當社會學問大問題，使用反身性，詮釋的方法，那麼這才會對經濟學和政治學有所挑戰。一個左傾、批判的新古典社會學，何嘗不可？

來信寄給 Ivan Szelenyi <ivan.szelenyi@nyu.edu>

註 1：我想大家會同意在 1965 年和 1975 年的社會學學生有跳躍性的成長，但是 1980 年快速減少。 (David Fabianic, "Declining Enrollments of Sociology Major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Spring 1991: Bronwen Lichtenstein, "Is US Sociology in Decline?" *Global Dialogue* 3.2, and http://www.asanet.org/research/stats/degrees/degrees_level.cfm)。 雖然學位人數一直在增加，可是相較於 1970 年代的高峰，人數還是相對少的。

> 全球社會學？

by Gurminder K. Bhambra,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國 ,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Conceptual and Terminological Analysis (RC35)內部委員

Gurminder Bhambra.

Gurminder K. Bhambra 是後殖民社會學的重要學者。她處理了社會學的在地偏見問題，指出殖民經驗和貢獻如何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其最新的書《Connected Sociologies》(2014) 論證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全球社會學取徑之不足，因為其把非歐洲的他者忽視了。她也關心非裔美國社會學的邊緣化，並且指出當代的公民身份概念怎麼忽略了其歷史不為人知的一面，也就是殖民和奴役的歷史。她也是新書系《Theory for a Global Age》的編輯。

全球社會學已經被提出來作為處理之前被歐洲中心主義現代性所排除的那些被忽略的議題。這也被用來討論邁向新的全球社會學框架。這個新的全球社會學關懷三個面向：第一，這是多重現代性的典範轉移。第二，這是對於多元文化全球社會學的呼籲。第三，這是支持全球世界主義的論證。雖然這些論點考慮到了非西方的全球，但是我認為還是不夠的。

相反的，我論證「連結社會學」取徑去重構一個後殖民和去殖民的歐洲中心主義批判，這可以作為理解全球現在更好的框架。連結社會學的中心關懷是重新思考社會學，把重置、殖民、奴役的歷史放回社會學中心。只有承認殖民的全球歷史，社會學才可以理解現在的後殖民和去殖民情境，一個批判的全球社會學才有可能。

社會學和現代性是相互構成了，一起隨著現代事件的浮現而出現，也和經濟與政治的革命有關，需要一個新的解釋框架。隨著這樣的理解的浮現，也就是把現代歸因給歐洲，世界的其他地方則變成了這個歷史過程的他者。殖民連結和過程被認為是現代性中不重要的，也是現代性的壓迫或是去形成化。雖然這些革命的歷史敘事和現代性本身也隨著時間變，但是整個歷史的框架--自主的內生根源和全球的傳佈--還是繼續再生產。即使很多人呼籲一個新的全球社會學，但是還是沒什麼改變。

>>

>多重現代性

多重現代性在90年代把現代化理論置換成不同的歷史社會學研究議程。現代化理論已經被馬克思主義者和依賴理論所批評。為了為多重現代性論證，學者避免了兩個錯誤。第一，就是只有一個現代性這樣的觀點(西方現代性匯聚收斂)。第二，從西方看東方的西方中心主義。這些學者論證，雖然批評現代化理論是歐洲中心主義，多元現代性還是以西方為參照點來檢視其他另類現代性。從這個方式來看，他們反而透過承認歐洲現代性根源的不可取代性來重新生產了既有取徑的霸權。相反的，我主張，一旦全球連結被承認和理解之後，這樣的看法應該被拒絕。

>本土社會科學

最近的全球多元文化社會學的論述主要來自於早期社會學的本土化運動，要求自主性的發展和另外社會科學的傳統。這種論述不怎麼影響西方主流的社會學，但是野雞擠了全球對話中許多的討論。一個辯論的重點是地方知識和實踐對於學科自主和發展的影響。像是多重現代性，對於什麼事自主的傳統可以提供給全球社會的討論其實很少。若是現有取徑的限制被看成是從缺乏和非西方學者的互動，那麼主要的問題就是邊緣化和排除。雖然這是很重要的議題，可是這也對於處理過於大有問題的社會學學科建構沒什麼貢獻，也讓各種建構版本一直繼續衍生下去而已。

>世界主義社會學

現在我希望可以談談第三種取徑，也就是一種以全球社會學為核心的普世主義。世界主義在這個脈絡之下是一種規範性的想法，在這之中，世界主義的未來可以形塑當今政治的地景。這個必須被透過世界主義典範所重新建構的社會學所支持，也以全球包容性為基礎。這個議題仍然只是可能，因為許多世界主義的理論家還需要「他們」被「我們」所包含。普世主義被認為是避免知識相對主義(包括西方社會學)的方式，但是對於世界主義如何被用來考慮以往被歷史忽略的世界的連結這點，還沒有太多的討論。承認這樣的歷史將會讓我們重新思考社會學的概念和分類，並從思考他者開始，而不是把他者看成問題。

所有上述討論的這些取徑都是透過加法來概念化全球，重視當代的多元文化與聲音，但沒有處理歷史根源與軌跡。三個都考慮全球作為當代連結的社會，介於現在和過去的文明化裡史之間，而不是認為殖民主義和奴隸是全球發展的核心。把全球當作唯一的當代現象，社會學的知識重建是希望可以應用到未來，有更好的對過去的詮釋和概念理解。為此，我建議保留現在學科的階層化。只是單純的把邊緣聲音納入，或許可以讓我們認為社會學在未來可以變得不一樣，但是卻不能讓我們承認到為了讓社會學不一樣，社會學必須要把自身連結到自身的歷史(以及過去理解自己的方式)。

>連結社會學

連結社會學的觀點是從承認組成事件的社會過程總是有更廣大的脈落。這承認了多元詮釋和選擇的可能性。這不是作為事件和過程的描述，而是一個重新考慮我們已知的知識的機會。不同的社會學所需要的連結座落在時間和空間的軸線上，包括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的時空交錯。這些新的社會學將會時常出現齟齬，並且挑戰現狀，甚至對於基礎有所抗拒(這樣的抗拒也因為學院的地理階層化而變得更容易)。而不同觀點激盪的後果則必須開放檢視，看看事件和過程在被不同觀點理解之後有何不同。換句話說，和不同的聲音對話必須超越簡單的多元主義，必須產生影響，不是大家都來想同樣的問題，而是我們都可以超越之前的觀點來從不同的角度思考。

把政治社群當作國家政治秩序這樣的觀點已經是歐洲自我理解和歷史社會學的核心了。然而許多歐洲國家既是帝國又是民族國家，而且更加階層化。例如，雖然大英帝國是歷史上多文化的政治社群，可是這個理解很少出現在當代政治論述之中，因為現在的政治社群被理解成等同於國家邊界。若不處理殖民的過去，後殖民的歐洲(和西方)是不完全的。這種自我選擇的理

>>

解所產生的政治震盪可以在許多國家中的選舉時的移民議題辯論中可以看見。

選舉代表了一個世代中了政治契約是可以協商的。然而這些契約包括了現在處境的協商，這發生在認同敘事的歷史脈落之中，照定義而言，移民是被排除在國家歷史之外的。除了政治社群的排除，移民也被排除在政治權利之外，被要求不要進入這個政體之中。然而，若我們了解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為更廣泛的一種活動，不只是原本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而已，也不只是把歷史化約成當代國家疆界的歷史，那麼移民是歐洲、也是民族國家歷史敘事的一部分。了解移民作為中心的國家歷史組成，並將其視為歷史公民，而不只是即將成為公民的人。

一個「連結社會學」的取徑需要從定位開始。這個定位是在世界中去找到促成這個世界浮現的過程為何。從這裡開始，我們必須從歷史出法，把這個位置和世界連結起來，並且指認出和解釋這樣的連結如何比認同和事件更回廣泛。常見的全球社會學取徑其實並不重視歷史，因為只關心歐洲的現代性怎麼被帶到其他社會。相反地，連結社會學家的方需要我們把歐洲放到更大的脈落之中，處理歐洲創造並且得利於殖民主義和奴隸制度的方始，並且檢視歐洲可以從中學到什麼，然後面對我們當今面臨的問題。

這個結社會學的取徑指出了一個方向，也就是去實踐重新點燃社會想像，連結全球社會的社會正義。■

來信寄給Gurminder K. Bhambra <G.K.Bhambra@warwick.ac.uk>

> 我們想要的未來

by Markus 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美國, ISA研究副會長, 2014-18

從世界各地而來的遊客、登山客、朝聖者等，觀賞富士山的日出。Markus Schulz 在 2014 年橫濱大會之後所拍攝的照片。該次大會的主題是「面對不平等的世界」。ISA 會持續關注這個議題，並著重在不平等的世界如何被超越，不同的社會行動者在不同的環境下奮鬥，以其全球社會學如何貢獻於這個議題。

Markus Schulz是ISA的研究副會長。他介紹了2016年7月10-14日在Vienna舉辦的ISA Forum的主題：我們想要的未來—全球社會學與邁向更好的未來。更多的訊息請見http://www.isa-sociology.org/forum-2016/

世界充滿了不正義、衝突、環境污染。可是，人們還是渴望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樣的夢想透過了勇敢的奮鬥，從Chiapas的叢林到Johannesburg的小鎮，從阿拉伯的都市街道上到Chicago，從移民的路徑到新媒體的虛擬空間，我們都看到夢想在茁壯。烏托邦的能量沒有被耗盡，並且依然啟發著各種創意。未見的風險和機會需要新的思考方式。

全球化已經釋放出了巨大的產能和財富。可是，它也創造了不平等、邊緣化、貧窮。市

>>

場、國家、社會，以及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已經透過不同的方式結構化的全球變遷。沒有任何的國家、城市、社區等可以免於全球化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和經驗卻是高度不平等和矛盾的。人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那麼多的移民，環境變遷也會加速這樣的趨勢。新的跨國空間已經增加了文化的多元性，可是社會流動性卻沒有提高。新的溝通科技加速的全球化，可是也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並產生新的控制、監控、和戰爭形式。

決定論的模型和軍事回應的邏輯已經被證明是短視的了，而且代價高昂，犧牲了和平和安全。永續的解決方案需要更深的方法與分析問題。新的全球動態結果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力量的結果，而是社會與制度的建構與形塑，也是能動的反身性。結果來自於選擇與決策，不論是有意或無意的。

許多國家的社會學中，未來是被忽略的。為什麼呢？許多因素之中，我想有一個觀點特別普遍，那就是人們不處理未來是因為我們對於未來一無所知。因為我們不能討論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只好閉上嘴巴。

這樣的觀點其實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實做矛盾，因為我們的生活都是奠基在我們對未來的預設上面，不論短程或是長程，大或小。無論我們認為一見事情可能或不可能，可欲或不可欲，我們都會有期待、期望、希望、想像、計畫、投射，這是人類的本能。

一旦我們接受的社會學是向前看的這樣的觀點之後，那問題是：我們怎麼概念化未來？什麼是最有效的方式，以及怎麼評價不同的思考實做模式呢？要知道答案，就要問什麼樣的理論取徑我們應該採取。

過去，未來總是被預設是被決定好的，或至少朝著某個方向前進，所以可以多少預測得到結果。社會學剛剛成立的時候，宗教信念讓位給了實證主義的社會法則，這也是Comte或Durkheim的視野。Marx則分享了類似的預設，說明歷史的法則是通過無產階級與布爾喬亞的鬥爭，雖然他也指出沒有機械性的公式，有許多的空間給認知行動的自由介入。從全球南方來的學者，包括Amin, Cardoso, Dussel, Guha, Quijano, Nederveen Pieterse, Saïd, Santos, Spivak等人，都挑戰了現代化的理論，因為現代化理論認為第三世界是發展落後的，而且唯有模仿北方才有可能趕上。

將社會經驗和期望脫鉤導致了理論的創新和高度不確定性。世界是有可能不一樣的。現實則不可改變，除非人類行動持續反思，衝突，合作。這樣非決定性的思考模式越來越在當代社會理論種可以看到，並透過社會能動的引入和多重歷史軌跡的交錯，開啟新的可能性、創意、想像、視野。

社會學的重新導向未來可以讓不論經驗、分析、規範性的取徑可以受惠，也可以讓宏觀與微觀的研究可以發揮影響力到整個世界。例如，行動理論最近的進展克服了實證主義的限制和狹隘的制度論。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的理論可以幫助辨識和理解政治的動態。時間向度的分析可以幫助找到歷時的脈動。批判理論可以幫助找出決策的的價值、揭開利益的運作、並且確認不同場域的社會後果。

社會不平等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包括人權侵害、氣候變遷、環境污染、以及各種分配、認同、治理的危機，這都需要我們的努力，超越狹隘的學科邊界限制與視野，找尋新的機會與可能。現在的經濟危機讓我們重新思考80年代提出的心自由主義模式，新的概念和方法也都必須被提出來面對我們的未來。若社會學要變得更切身相關，那麼就要向前看，要和不同行動者所提出的觀點相互激盪，想像未來。■

來信寄給Markus S. Schulz <markus.s.schulz@gmail.com>

> 法國社會學家辯論查理週刊事件

by Stéphane Beaud,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Paris, 法國

Paris Metro.，Fabien Truong攝影, 一月12日, 2015.

社會科學有辦法對於發生於 2015 年 1 月 7-9 日的事件提出一個「精確」的評論嗎？(事件指的是查理週刊的攻擊事件和猶太超級市場的反猶殺人事件)。或是說，我們最好保持距離，讓那些對社會學家懷有敵意的發國媒體知識分子評論就好？保持沉默似乎很難，特別是在我們看到了這起事件對於法國社會的影響力、以及於 1 月 11 日的大遊行之後，我們似乎很難繼續保持沉默。

在法國 2005 年暴動之後，Gérard Mauger 建議應該要有社會學家對該暴動事件提出看法與研究。而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大眾媒體也刊登了社會學家的不同觀點，讓大家有機會看到不同的公共社會學立場，因為這不可避免是理論又是政治的。然而這些評論又點燃了一個長久以來的爭議：什麼樣的因果關係是社會學家必須優先用來解釋一個事件的呢？個人行為和社會背景應該被強調到什麼程度？而奠基於社會結構因素的解釋是足夠的嗎？這些社會分析可以免除個人的道德責任嗎？相反的，個體主義的邏輯會

>>

不會主導了社會學呢？

這些爭議開啟了一場很棒的辯論。而第一個加入戰局的社會學家是 Hugues Lagrange，他是在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at Science Po 的研究員，主要研究 Paris 郊區的青少年犯罪。他拒絕「政治正確」的犯罪解釋，而將族群文化的根源視為獨立的因素，而非社會經濟歧視的結果。而 Kouachi 和 Amedy Coulibaly 的社會背景 (移民第二代，在都市邊緣的不穩定家庭長大，學業表現不佳，有前科，等等) 和其之前的報導人一致，這也是其發表在 Le Monde (January 14, 2015) 的主要論點。他的文章：「有勇氣看到去社會化弱勢族群的道德錯誤」的論點主要有兩的面向。第一，他承認那些在邊緣社會長大的青年是「去社會化」的，被困在冥頑不靈和充滿敵意的次文化之中。這些年輕人試著要透過新的宗教實踐，包括 Salafism 和其他的激進伊斯蘭教派，去重建他們「受損的自尊」。可是 Lagrange 說道，法國知識分子不去探究有問題的傾向 (男性沙文主義、性別歧視、恐同、暴力、反猶主義等等) 以其如何導致了法國青年的迷失，因為他們不敢把這些連結到殖民主義，因為他們會感到罪惡，不趕面對那些從殖民地來的弱勢族群所帶來的道德錯誤。

接著，EHESS 和 Princeton 的人類學家 Didier Fassin 加入了辯論，重申社會學家的任務是客觀地解釋「社會原因」。年輕人在邊緣的都市歷經了社會和空間的隔離，高失業率，污名、歧視 (工作、家庭、警察) 等等，他說社會科學家應該避免歷史學家 Marc Bloch 所說的「評價的習慣」。Fassin 認為，「我們的社會已經產生出了其所反對的巨大醜陋」。

Laurent Mucchielli 是 CNRS 的研究者，也是青少年犯罪專家，提出了長期的觀點 (Mediapart, January 2015)。他說，法國還沒有接受自己是一個有著為數眾多北非移民的國家，特別是 1960 和 1980 年之間。這有兩個後果，首先，移民被政策所排斥；第二，法國社會不承認自己是個多元族群但是不怎麼多元文化的社會。所謂的承認，就是要去承認伊斯蘭是這個社會基本組成的一部分，而且同時這個社會也在質疑、害怕、立法防堵這個部份 (像是 2004 年的立法禁止頭紗)。Mucchielli 呼籲要建立普遍公民身份，社會連帶，以及集體認同。我們研究和這個立場一致，從經濟邊緣化、宗教污名化、以其種族主義等觀點來解釋。這是有力的觀點，但是我們做得還不夠多。

我想有兩條路可以讓我們前進。第一，Cyril Lemieux (EHESS 研究者) 在其文章 Unease in sociology (Libération, January 30, 2015) 闡明了一種「理論」立場。Lemieux 是「實用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強調了「某些」社會學解釋框架的限制。這可能特別針對被 Bourdieu 所啟發的批判社會學而來。他說，這些社會學家忘記了除了結構性解釋之外，還要認真看待穆斯林青年聖戰士對宗教的渴求和期待。此外，Lemieux 認為那些社會學家忽略了那三百五十萬的「我是查理」大遊行的政治和象徵的操作面向。市民上街，是因為這麼做對於道德和政治教育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最後他重新肯任了市民的自我反身能力，而這個能力，他認為，是批判社會學家所拒絕的。

第二個方法是經驗取徑，就是考慮那些不適用於巨觀社會學和結構性解釋的因素。三個事件中的兇手都被歸類成貧窮和有困難的人。而 Kouachi 兄弟在青少年早期是孤兒，並在 Corrèze 的兒童支持制度環境中成長。他們並沒有完全被剝奪掉制度支持，也不是種族歧視的犧牲者。例如 Amedy Coulibaly 就受益於百事可樂的技職訓練，而且還在 Elysée Palace 裡見過總統 Nicolas Sarkozy。類似地，Saïd Kouachi 是 Paris 市政府的「環保回收大使」，雖然 2009 年被解僱，因為其宗教的信念 (拒絕和女性握手、一天祈禱 5 次)，使得他和其他的同事產生距離。

這個觀點提醒了我們一點，就是並非所有的法國聖戰士都是從貧窮地區被徵召來的第二代移民。有些青少年是在 pavilion 長大的，而非 cités。像是丹麥等國家，沒有殖民地的歷史，也善待移民，但是也受到同等的威脅，那又怎麼解釋呢？所以在我們把解釋和問題化約到巨觀社會學的因素時 (貧窮、無技術移民後代青年、歧視、制度化種族主義)，我們是不是也正在強化了把這些青少年歸類成「危險」族群這樣的刻板印象呢？

宗教社會學或許可以幫助理解這些年輕人的宗教情感，以及他們獻身於教派運

>>

動的動機和特徵。這樣的解釋也需連結到我們怎麼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極端主義運動背後的教條和邏輯，以及他們從伊斯蘭實踐所得到支持為何。我們必須考慮查理週刊事件發生的脈絡，以及這些青年如何對於查理週刊嘲諷宗教的幽默產生反感，因為這種反感與敵意，對於由週刊所體現的 1968 文化下所成長的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特別還是週刊稱此自己是「愚笨且有害的」。所以，Julie Pagis 無法理解查理週刊對於伊斯蘭教嘲諷的特別重要性為何（相較於其他宗教）。其重要性在於，週刊攻擊了這些青少年唯一的正面依附和連結，同時也攻擊了他們父母親的殖民與勞工階級的過去。

因此，我們可以問社會學的不同預設為何，也可以問媒體如何建構了社會學的權威性。一個基本的問題當然是誰有權說話，而誰沒有？事件之後，北非移民的後代之中成功的創業家和藝術家（演員、音樂家、喜劇、作家）和運動員開始發聲。而學術人員也是，他們問了 W.E.B. Du Bois 的問題：「成為社會問題的感覺是怎樣？」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可以提出在那些都市邊緣做研究遇到的困難，像是 Kouachi 和 A. Coulibaly 所居住的地方。我們沒有豐富的 cités 民族誌，但是這很重要，因為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轉變很大。我們需要經費去研究這些問題，並且資助那些具有這些背景的社會學家。■

來信寄給 Stéphane Beaud
<stephane.beaud@ens.fr>

> 極端主義政治
查理週刊事件的前後

by Mabel Berezin,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美國,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ological Theory (RC16)成員

Marine Le Pen是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全世界的政治領袖和公眾把查理週刊事件看成是對言論自由的攻擊，也是對核心民主價值的攻擊。可是，整起事件的演變讓人們了解到兇手的背景其實有著更多的政治與社會重要性。例如，隔一天，在猶太超市犯下殺死四人的兇手讓記者寫道這就是 1930 年代政治幽靈的回魂。

查理週刊是法國和歐洲的 Sarajevo 時刻，這意味著這起攻擊事件可能會為法國、甚至法國之外的國家帶來政治危機。此外，債務危機、撙節政策、難民、青年高失業率、反猶主義對猶太教堂的攻擊等等，這些現象都滋養著歐洲右翼民族主義的興起。

法國的 National Front 和領導者 Marine Le Pen 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了。她繼承了父親的政治領導，反對移民的立場，是該政黨的正字標記。而 Marine Le Pen 的目的是讓 National Front 成為執政黨，而不是只是爭議性議題製造者。並且著重在撙節、歐元危機、失業率。讀者若是不熟悉 National Front 的歷史，就會不了解為什麼她的立場造成了那麼多人的恐慌。Marine Le Pen 最近在《New York Times》投稿一篇文章名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認為這是伊斯蘭的癌細胞，傷害了「我們穆斯林的的國民」。這篇文章讓歐洲的公眾認為這個小黨其實並還算正常。

> 速度和政治揮發性

但是對於歐洲民主的威脅還是存在著。第一是歐洲政治地景的板塊挪移的速度，選民偏好，和情感的揮發性。第二是政治和經濟危機之間負面的結合，特別是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

>>

希臘的Neo-Nazi Golden Dawn運動。

2012 的春天是一個轉捩點。借用 Eric Hobsbawm 的話來說，是「充滿能量的民族的春天」。歐洲的政治變動似乎加快了腳步，一個接一個的選舉意外結果。左與右的政治極端主義開始在政治選票上有所收穫，雖然 François Hollande 贏得了大選，Marine Le Pen 卻也是第三名，結合在一起，極左派和極右派吸引到了更多的選票，甚至比原來的總統 Sarkozy 還多，也比社會主義的挑戰者多。

在大選之後沒多久，希臘的新納粹政黨，也就是暴力的反移民 Golden Dawn，取代了原本的右派政黨，而原本默默無名的 Socialist coalition 也取代了 Socialist 黨。2014 年末，只在查理週刊事件的之後不久，希臘又再次大選，Syriza 執政，而 Golden Dawn 成為第三大黨。瑞典的選舉動盪也出現了。其不是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一員，也不受歐盟的撙節政策影響，但是瑞典的國會大選中，右翼的 Sweden Democrats 也從 2010 年的 6% 選票上升到 2014 年的 13%。

在同一個時期，義大利的 Five Star Movement 也出現在 2013 年的選舉之中。而西班牙的左翼 Podemos 運動則嶄露頭角。雖然德國的右翼反移民運動 Pegida 是唯一少數的老字號政黨，但是也有可能發揮影響力，這情況特別是在 Thilo Sarrazin 的 2010 書《Germany Is Doing Away With Itself》成為了暢銷書之後，更是如此。

> 負面協力和政治情緒

儘管這些政黨有著很不同的特徵，但是有著一個共通點：就是對於民族國家的信念相當堅定，不信任歐洲整合，也反對全球化。他們反對歐元，也反對撙節。

查理事件讓移民和整合的議題成為了緊急重要的課題。若是歐盟的撙節政策嚴格的施行，讓 Le Pen 等人可以把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描述成危險的事情，那麼查理週刊的慘案讓他們更有理由反對移民和宣稱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存在。雖然這早就是歐洲右派的論述了，但是法國的總理在事件之後說道「族群和社會隔離」時，還是弄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右派論述。

1919 年，John Maynard Keynes 寫道：「接

>>

下來要發生的事件將不會被政治人物的理性行動所形塑，但是會被隱藏的暗流，隱藏在政治歷史表面下的暗流所影響，而沒有人可以預知結果。」Keynes 對於一次戰後歐洲的的評論適用於現在的歐洲，讓人不寒而慄。

我們正在見證歐洲 1930 年代法西斯主義的回魂嗎？雖然 Golden Dawn 擺明了支持法西斯主義，法國 National Front 和瑞典 Sweden Democrats 都是民族主義政黨，不是威權主義。一些人物像是挪威的 Anders Breivik 不應該和現在的政治發展相提並論。若要說法西斯主義再次出現在歐洲，我想是太過簡化了，就像人工打字機要再次成為主流，是不太可能的。歐洲的民族國家大體上都是程序民主國家，即使匈牙利的總統 Viktor Orban 支持「不自由的民主」，但始終還是有民主的元素在。

但是這麼說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擔心的理由。歐洲的隱藏潮流是相當黑暗的，而且集體的情緒召喚著歷史。Sebastian Haffner 關於 1930 年代德國的自傳裡面，指出了希望、絕望、恐懼、誤導的憤怒等，都是希特勒發跡的不可或缺因素。類似的集體情緒在今日的歐洲還是可以看見。在法國，在近日的民調裡面，人民「失去信任」、「失望」、「喪志」等等都可見一斑。而「熱情」則是最後一項，這也不意外，因為保守派記者 Éric Zemmour 的 French Suicide [Le suicide français] 是法國今日的暢銷書。

若沒有經濟危機和撙節政策，極左和極右的極端主義政治不可能具有吸引力。自從 70 年代以來，經濟政策並沒有運作得太好。相似地，移民和融合政策不論是以 19 世紀民族主義或是多元文化主義為基礎，都必須再次考量。要超越現在的困局，歐洲領導人必須要想像和實行新的社會團結政策，納入所有的公民。領袖必須重新點燃人民集體的希望：一種可以想像未來的能力。經濟政策重新校正是個出發點，但不是終點。歐洲領袖要務實的思考政治社群的意義，因為社群的邊界還是民族國家的邊界。政治人物也要對抗那些其實不是那麼隱藏的暗流，或是對抗那被查理週刊事件所接收的政治風險。

來信寄給 Mabel Berezin <mmb39@cornell.edu>

> 田野筆記

在歐洲體驗恐懼

by Elisabeth Becker, Yale University, 美國

Elisabeth Becker在一座清真寺慶祝。

田野民族誌可以讓我們進入其他人的世界，觀察和參與他人的日常生活。不像檔案研究、訪談調查、或是實驗方法，民族誌其實會受到真實世界的打擾、中斷、改變。這就發生在我於歐洲的三個國家的清真寺田野研究中，特別是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

我選擇清真寺作為田野場域是因為我想要研究穆斯林在歐洲的文化與精神生活，以及他們怎麼面對污名。我也想要知道穆斯林的日常生活面貌，從細微的禱告等日常實做去切入他們的生活肌理，並參與其中，而非分析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進入田野 — 在 Berlin, London, Madrid 的清真寺—是需要個人層次的轉變的。我同時是一個追求時尚的女性主義者，所以我對於怎麼在維護自己的認同為前提之下呈現自我與田野場域

>>

中，是相當掙扎的。首先，我不知道怎麼戴頭巾，不是蓋住臉就是掉到地上。後來我發現我戴上頭巾或是 Hijab 之後， 在 Berlin 搭公車都會遭來異樣眼光。 在 London 的 Algate East 可以自在地點咖哩，而在 Madrid 的清真寺則也會遭到注目。當我以穆斯林的身份生活時，我是會感到恐懼的。

我不會害怕在德國有人從腳踏車摔下來時看到我的頭巾因此生氣，但是我會害怕右派的 Pro-Köln 運動，他們是一小群人，但是有很大的聲音，要求在 Köln 這個天主教城市禁止清真寺的設立。我不會害怕清真寺，唯有一開始進入田野的時候年長的穆斯林女性會不了解我在那邊幹什麼。我穿得很得體，但是還是和她們不一樣。我嫁給了穆斯林。而穆斯林女性總是會調整我的頭巾，加上另外一層，並且放下多額外的的頭巾到肩膀上面，並且把我的褲管拉低，然後把襪子拉高，「幫助」我屬於這個空間，另外就更不用說教我阿拉伯字了。她們甚至要求叫我 Fatmah，因為她們不確定擁有 Elisabeth 這個西方名字的人在這裡是不是另有其他意圖。她們想要把我改名，以保護她們的空間，並且確定我了解她們的規則。這些都是我在 London 做田野時的恐懼，不過算是小的，也是田野研究者普遍都會遇到狀況。

而我在 London 的第二個田野地點，我感覺到比較多的自主性。我和我的田野對象的區別在這裡比較清楚，她們幾乎整個人生都在這邊了。而或許矛盾的是，這樣的區別反而讓界線有點模糊。我可以超越界線，和我所認識的女性朋友討論小孩，或是食物好不好吃，即使我們有著很不同的審美觀。這些女性也質疑我在這邊的「真正」動機，而許多人也相信我的學業是比我肚子裡的小孩還要次要的事情。

我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數周到達了 Madrid。我喝著昂列咖啡，走過 Retiro Park，而我的清真寺搜尋很慢才開始，當我問地點時，很多人疑惑地看著我。「妳確定 Madrid 有任何的清真寺嗎？還是妳是說 Cordoba?」他們總是這樣回答我，彷彿什麼都不知道。當我問穆斯林女性時，她們笑說，清真寺不會在城市裡面，不會在首都。我可以感覺得到，穆斯林社群在西班牙有著長期以來的恐懼。這不是因為 Paris 的攻擊事件而來的，但是這個事件惡化了遠本的恐懼感。查理週刊事件之前，在我第一個拜訪的 Madrid 北邊的清真寺，女性都閃我遠遠的。我想要參加她們的活動，她們都說沒有活動。第二個地點比較南邊，守門的人問我是不是真的來到了對的地方。我說是，他就把我帶到有小孩子和母親的地方，小孩子吻我的小孩的臉頰，而母親們則疑惑地看著我。

然而，事件之後，疑惑的眼光不再，因為幾乎人去樓空。我在一間小 masjid 禱告，可是從來沒有人出現。即使是最大的清真寺裡面，們都鎖起來了。我帶著我的小孩，只遇到幾個女性，兩個在聊天，兩個在禱告，一個在睡覺，沒有人理我。恐懼的感覺穿透我的皮膚到我的骨頭裡面，這是我做研究以來，第一次感到事情非常不對勁。

在 Madrid 我也感到恐懼，特別是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清真寺幾乎都空了，取代的是警察的巡邏。警察帶著槍，到達 Puertadel Sol—陽光之門—也是城市的中心，警笛聲大作。Pegida 運動 (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cization of the West) 的抗議就在清真寺外面。這個運動在去年 10 月於 Dresden 成立，即使他們的抗議是非法的，但還是發生。查理事件之後，清真寺的牆上都被寫上「滾回去你們的國家」或是「伊斯蘭該死」的字眼。我也在人與人避免聯繫的社會過程中發現恐懼。人們質疑我在這裡的目的，認為我不單純，不能在這邊做研究，也懷疑我和我的小孩。

我在查理週刊事件之後認真考慮要中斷我的研究，因為我似乎低估了這個研究的政治敏感度。我的想法是我想要把我研究對象的政治、文化、社會

>>

生活放入括弧，但是實際上政治卻穿透了這個宗教的世界，也穿透了我的田野經驗。不論背景為何，清真寺都受到了威脅。這也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待在清真寺裡面是危險不安全的。而事件之後，我甚至收到美國朋友的來信，問我 ISIS 在沙烏地阿拉伯犯下的案件，問我如何可以和穆斯林有來往，問我會不會感到羞恥？會不會害怕？我和西班牙的穆斯林年輕人的一次對話內容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他們說他們要不斷地說明他們和 ISIS 的不同，證明自己是不同於他們的。

在 Madrid 的恐懼隨著我回到了 Berlin。朋友說，她們總是待在家裡面，也說地鐵裡面總是看到不確定的笑容，以及也考慮要搬離開歐洲。年長的土耳其男性也都說要回到土耳其，年輕的穆斯林男孩則說要他的姊姊在有一次幫助非穆斯林的人上巴士月台的時候所收到的威脅，路上的行人也不讓路。「某人應該拿刀砍她」，說這話的人在巴士上，並不是小小聲說而已。而該男孩問起我在美國 North Caroline 被殺死了三個穆斯林年輕人，「無緣無故就被殺？」他眼中泛著淚。這是一個 11 歲的小孩，是玩魔術方塊的專家，只喜歡 Ferrero Rocher 巧可力，但，連年紀輕輕的他，也感到巨大的恐懼。

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讓我們都容易受傷，更容易感到害怕。民族主義右派運動想要利用這種恐懼，並拒絕承認我們其實某個意義上都是邊緣人。在德國，右翼的 Pegida 運動已經在 Dresden 號召到了 18,000 人，想要「抵抗伊斯蘭化」。或許 Angela Merkel 會說穆斯林屬於德國，並且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可是恐懼和威脅還是蔓延著歐洲。並且社會真實的面報也被查理週刊和 ISIS 等的攻擊行動所模糊掉了。

不論是研究者或是公民，我不知道怎麼處理這種恐懼，這種深入皮膚底層的恐懼。安全和懷疑只會模糊焦點。我必須要可以和其我的鄰居，不論種族和信仰，抵抗極端主義，並透過我們想要維護的公民傳統。我是局內人也是局外人，是在兩個世界遊走的研究者，我的恐懼從日常生活變成存在意義上的。我在退縮，退縮的界線之內，而那些界線是我想要跨過的，也不相信的。但是現在，我沒辦法兩邊遊走了。■

來信寄給 Elisabeth Becker
<becker.elisabeth@gmail.com>

> 搜尋巴基斯坦的社會學

by Laila Bushra,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以西方的標準來看，社會學在巴基斯坦很難稱得上是一門學科。Hamza Alavi 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國際看到的社會學家，主要的作品發表在 60 和 70 年代。從 Alavi 之後，沒有真正嚴肅的社會學作品出現過。而歷史學家、政治學家、人類學家到是有，已有最近出版的一些關於伊斯蘭軍事運動和巴基斯坦軍隊與地緣政治的作品。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或是自我標榜的社會學作品還是缺席的，也沒有社會學的組織或是期刊。

巴基斯坦所謂「實存」的社會學包括了五位社會學家，三位在美國、兩位在英國接受訓練。他們在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LUMS) 教書，聽起來有點諷刺。這五位之中，有兩位的教學和研究重心轉移到哲學和政治學了，其中一位休假中。在這個歷史脈絡下，可見的未來其實不用期待什麼。

1990 年代，LUMS 是最有名的私立商業大學，設立了第一個四年制的學程，主要是由歐洲和北美訓練出來的老師教學。因此，產生了種特別且昂貴的美式大學教育學程，脈絡是巴基斯坦的公立大學成效不彰。雖然 LUMS 的學程只有提供經濟和資訊科學的學位，但是課程其實包括了一些社會科學的科目。不過這些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科目主要是陪襯的，有老師授課才提供，並且是由兼任的教授所開設的，並且通常是在地的師資，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或是心理學家。

從一開始，學生即使是為了來 LUMS 學習那兩們主要的領域，他們仍就相當正面的反應這是一個新鮮的設立 (巴基斯坦的標準來說)。隨著時間過去，社會科學逐漸成為了獨立的主修科目，主要是為了因應越來越多的學生沒有辦法符合資訊和經濟學的嚴格標準，但是還是想要拿到學位。另外也是整體來說學生人數的增加導致。

LUMS 的大學學程已經有 20 年了，而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系所也歷經了一段歷史。終身教授的其中一些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重新制定課程規劃，必且透過學科邊界的鞏固去定義其位置，而非只是不加區分地看是拿到什麼學位而已。我是唯一的社會學家，而我當時是被人學家所聘用的。而系主任本身就是人類學家，最近將社會科學主修拆程許多社會科學的科目，像是政治和經濟、政治學、社會人類學、歷史、英文，還有副修像是心理學和哲學。我們每年至少舉辦一次跨學科的國際會議。必且和國際學者合作。但是我們還是面臨了像是師資、學生要求等的老問題，以及管理階層的敵意等的新問題。

除了少數幾位老師為了個人或是研究的需要而打算紮根在巴基斯坦，其他的人都還是希望有更好的機會到歐洲、北美，或是東亞或是中東等地方。許多人延長了休假，到國外去短期客座或教書，希望可以找到終身職的工作。

而管理階層並不認為高教師流動率是個問題。他們偏好的是鬆散、比較不組織化的社會科學系所，或許連系所都可以不用設立，而老師就都用臨時兼任的就好。的

>>

「我們是沒有社會學的國家，不過我們很需要社會學的分析！」

確，LUMS 的中央管理階層並不喜歡超過兩年的新的學位，並且不尊重社會科學。學生或許有興趣，可是沒有人會認真把這個當作主要的領域。每年管理階層都會給我們一份調查關於學生想要的主修科目，社會科學常常墊底。比我們還要慘的是歷史。學生會選修我們的課，可是不會當成主修。

還是有成功的地方。許多學生到了研究所的時候就會去申請社會科學，而且他們的被錄取率很高。在這邊也是如此，許多學生希望可以畢業之後到媒體界、智庫、或是國內化的公司組織工作，領域包括了發展、媒體、公共政策、都市研究等。若是這些學生足夠聰明、有動機、有野心，我相信他們持續會做這樣的選擇。至多一個或兩個學生每年會立志朝學術邁進，不過不太可能是社會學。

若巴基斯坦沒有社會學，那麼或許社會學可以多些努力來到巴基斯坦。我不期待受過西方訓練的社會學家會來到這裡，甚至巴基斯坦公民都很少會留下。而且要社會學家和巴基斯坦學生互動也是很困難的事情。2008-2011 年我舉辦了一系列國際的演講，希望國際的教授可以來和這裡的學生互動，啟發這裡的學子。在政治學和歷史學有成功的例子，但是沒有社會學家願意來。或許可以期待未來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變，我們也要更積極地和 ISA 互動，有些計畫像是全球教室就很適合我們。

不過，或許最重要的是期待世界各地的社會學研究生。我想說的是，巴基斯坦不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但卻是被誤解得最多的國家。這個國家和社會並沒有被系統性地分析，所以想要挑戰困難問題的研究生或許可以考慮來巴基斯坦研究。博士生也可以考慮來到這裡教書的優點：有動機的學生、教學自主性、合理的教學量、和其他領域的學者交流。我們是沒有社會學的國家，不過我們很需要社會學的分析！■

來信寄給 Laila Bushra <laila@lums.edu.pk>

> 巴基斯坦社會學的前景

by Hassan Javid,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當我剛開始在找工作的時候，我知道社會學家可以找的工作可說少之又少。巴基斯坦就像世界其他類似的國家一樣，科學和工程被國家所領導，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地位非常偏遠。即使有社會學系所，制度的限制也讓這個學科有跟沒有一樣。在公共部門中，政府總是介入課程規劃和設計，並且總是對學術有敵意，所以環境不利於教學和研究。私人部門中，大學總是希望設立經濟、商業、資訊科技等等，因為這些最賺錢。

在這個脈絡之下，我申請了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LUMS) 的工作，這是一個巴基斯坦頂尖的私立大學之一，而且是少數願意支持社會科學的大學。當我申請工作的時候，LUMS 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院剛歷經改組，之前的雖然授予社會科學學會，但是現在變得更加專門化。所以，雖然我申請的是社會學，可是我加入了政治系，

我的背景是政治和歷史社會學，興趣在國家、階級、和南亞的民主化。所以在政治系工作對我來說不是問題。政治系有空間也需要額外的師資，而且政治學是僅次於經濟和金融的最受歡迎的學科，每年有 150 名大學生主修，這和人類學和社會學系有很大的不一樣，因為這些學科只有 10-20 名新生。大家也都相信政治學比較好找工作，而且也影響到師資的聘用。所以社會系在缺乏老師和學生的情況下，只會越來越邊緣。

在巴基斯坦工作的限制也很多。即使在 LUMS 這個相當特別的大學裡面，言論自由受到很大的保障，但是研究的資源卻是很少，物質或制度的支持短缺，而且沒有研究生。這些困難也因為缺乏更廣大的學術社群而更加嚴重。

巴基斯坦是一個多族群、多宗教的國家，大約有 2 億人口，殖民時期的影響很大，並且快速都市化、經濟變遷、民主化等，也帶來了文化、抗爭、社會運動的興起和改變。可是，在 911 事件之後，對於巴基斯坦的研究都放在伊斯蘭和軍事上面，越來越多的資源被投注在這裡，特別是西方的資源，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致力於這些應用問題，所以一般的學術研究已經開始下降不少。政治學裡面，這意謂著國際關係和安全的議題越來越受重視，同時，量化方法也受到國外贊助者、組織、政府的喜愛，許多研究都聚焦在很窄小的政策問題上面，而且只能用經濟學裡面的計量模型所回答的問題。所以巴基斯坦被視為是暴力宗教極端主義的中心，而治理問題則可以被那些政策研究的模型解決。這樣的偏見反應在最近關於巴基斯坦出版品之中，即使是研究左派政治或是農業經濟的書都可以看見伊斯蘭出現在標題裡面。

>>

「無論在公部門或是私部門中，社會科學可以說是幾乎不存在的。」

作為在政治系教書的社會學家，我逐漸發現唯一的研究、社會、理論等的對話都是在這些情況下發生。可是我的研究中，我已經研究了國家和南亞精英的關係，重點擺在殖民時期的制度和介入，特別是農業經濟，有著對於資產階級去追求他們自己利益有很大的影響。我也對於解釋巴基斯坦當代民主政治很有興趣，也希望可以研究精英權力怎麼樣在經濟、政治、社會的變動情況下，被重構和再生產，。

在和伊斯蘭與政策沒有直接關係的情況下，這些問題其實沒有太多人有興趣。相同的還有族群、性別、都市化等議題。此外，社會學家也仍缺席。我大多數合作的都是經濟學家或是政治學家，但我也發現他們的視野其實都是從他們的學科出發，並且都是他們贊助者青睞的。其他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也都遭遇類似的經驗，學科之間的概念和方法差別大到讓我有點沮喪。

巴基斯坦的社會學雖然讓位了給經濟學和政治學，因為這些學科都有企業和政府的贊助。所以未來其實也不會有太大個改變，市場和政治讓巴基斯坦的社會學沒有辦法建立，也讓許多學生只好選擇其他的科目。不過，即使如此，巴基斯坦還是歡迎那些要追求有趣且有挑戰問題的學生！■

來信寄給 Hassan Javid <hassan.javid@lums.edu.pk>

> Ulrich Beck,

來自歐洲的世界主義社會學家

by Klaus Dörre,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y, Jena, 德國,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Sociological Theory (RC16), Sociology of Work (RC30),
Labor Movements (RC44),和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RC47) 委員

2014 年 Beck 接受了終身成就獎。這個獎項是由 ISA 的未來研究委員會 (RC07) 所頒布，表彰對此領域的貢獻。

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概念剛提出了了時候在德國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他的論點相當有爭議性，那就是社會實在已經不再被社會學的概念所掌握和描述了，而且一種近乎革命性的轉變就是多重現代性的誕生，而且就在似乎無懈可擊的工業現代性裡頭誕生的。若想要了解這個轉變，那麼就必須打破「馬克思-韋伯現代性共識」和其線性的預設。Beck認為現代性的主流社會學理論，特別是資本積累(馬克思)或是理性化和官僚化的線性成長(韋伯)，是一種「超主體限制」(supra-subjective constraints)，描述社會行動者的法則，以其所有的社會行動都要服從這些法則。Beck則提出self-endangerment的概念：「更進一步的現代性正在消解工業社會的輪廓」。在過去的自動現代化進程之中，工業社會已經「太過頭了，甚至被『廢止』了，就像工業社會現代性去鑲嵌化了地位和封建社會一樣，然後再鑲嵌了自己。」

Beck視三種發展為轉變到不同現代性的三種指標。第一是不可預期的工業生產副作用，也是Beck認為的歷史推動力。生態風險和不可逆的影響已經成為全球威脅，一種民主Allbetroffenheit，也是一種對所有人都有關系的威脅，最終不會區分誰是工人誰是資本家。「風險分配的民主邏輯」已經逐漸取代「財富分配邏輯」，所以不能再用階級鬥爭、理性化、功能差異等等來理解。Beck說：貧窮是階級的，但是霾害是民主的。

第二，這個生態社會的衝突伴隨著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當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無法減小，特別在戰後，社會就會形成許多層級，就像是「電梯效應」(Fahrstuhleffekt)。即使最少的財富平均來說也遠遠多過於之前的世代，而且也有更多的個人選擇。

傳統社會環境已經大大削減了，階級也不在是一個人的經驗世界，僅僅成為統計的數據而已。個體仍然是最後的生產單位，被迫成為計畫的中心，規劃自己的人生，並且接受可能永遠無法翻身的缺點。主體被「設定成自由的」，階級、層級、性別角色的社會形式無法限制個體，個體不會被「釋放」到社會組織的實際限制之下。

>>

第三，這是Beck的公民社會次政治的浮現。這也是工業社會政治和非政治邊界之消解的起點。科技的進步變成社會分類的合理化的依靠。不論是否主題是核能或是基因工程，專家都總是要準備好在辯論中可以和一般民眾溝通。左和右的的傳統區別沒那麼有用了，因為新右派支持釋放市場力量，去管制化，加速科技進展，而生態的左派則用了比較保守的保存觀點，應用到自然環境上，因為這總是被擁有和社會化的。生態運動和綠黨的出現，以及其他的結構政治變遷，都代表了一種發展，這種發展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政治和非政治之間變動的邊界所解釋。

Beck的整個學術生涯有時後會修改風險社會理論的核心論點，但是都是改進。雖然風險社會是非常德國的作品，特別是社會風險的個體化那一章，但是Beck馬上處理的世界風險的議題，這是生態危機全球化的結果。在這個地方，他倡議了世界主義的觀點，把跨國空間和政治考慮進去，甚至討論複雜的世界風險社會錯置。其對於發展反身現代性理論的努力也讓其有了其他作者的迴響：Anthony Giddens, Scott Lash, Bruno Latour

如果我們仔細想想Beck的貢獻，他對於生態社會衝突的社會學理解可能是最好的觀點。他對與生態風險的知識和定義的嚴謹思考就像他討論「危險的權力」一樣，仍然很重要。的確，氣候變遷的風險是今日政治鬥爭的中心，卻許會暫時被擺到一邊(就像現在大家在忙著討論歐元危機)，但是終究會回到中心，以社會動盪的形式出現。

Beck的最後的成就是指出了這樣的現實並且轉譯成社會學概念。是的，他對於「沒有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診斷後，認為要「回到階級」，因為階級差異現在越來越明顯，甚至國家之間的階級差異更大。社會錯置、發展停滯、生態浩劫等等把「財富分配的邏輯」和「危機分配的邏輯」轉變成相互增強的兩者，增強了經濟—生態的危機。向上社會流動的方式變成了非得要把人退下去才得以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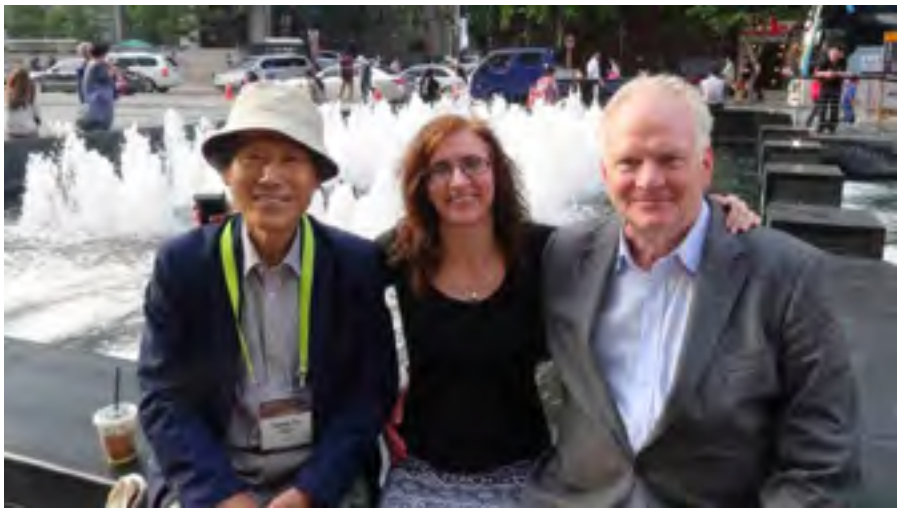
Ulrich Beck清楚地看見了發展(也恰好了呼應了古典的資本主義理論)，但是他並沒有或是沒意願去分析非傳統階級的形成。可是Beck對於時代精神有很棒的理解，也對新的和非預期的發展有很好的觀察。最近的Beck作為一位世界主義者和民主歐洲人，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對「Merkiavellism」。他認為這會讓南歐成為永久的次等地位，因此會威脅歐洲的整合。

Ulrich Beck留下了深刻了知識足跡，若沒有他，我想我不會成為一位社會學家。他走得太快，並且留下了許多無法馬上填補的空隙。我想德國和整個歐洲社會學要過了一段時間才會知道到底失去了多少。反生現代性的理論仍然有待持續建構。重新評價這個原創性的思考或許是一個可以繼續發展Beck知識遺產的一步。■

來信寄給Klaus Dörre Klaus.Doerre@uni-jena.de

> Ulrich Beck 在拉丁美洲

by Ana María Var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tín, 阿根廷,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RC24)內部委員



圖：Ulrich Beck和Ana Vara 與Sang-Jin Han

怎麼樣衡量 Ulrich Beck 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呢？他的作品巧妙地連結了人類、環境、和科學技術知識，對於那些被自然所定義或是工業做所追求的不論是一般人或是社會科學家，都有著很大啟示。

在 Beck 的風險社會概念和其他拉丁美洲的依賴發展主義理論之間，其實有著很深的連結。後者為了解釋拉丁美洲的後殖民處境，忽略了歷史過程之中不論是外國或是國內精英對於自然資源的無盡剝削的這社事實。這已經變成常識，而且是 1970 年代依賴理論背後的預設，也是現在關於 extractivism 或是 neoextractivism 的背後基礎。我沒有辦法去直接理論化 Beck 風險社會與這個論述之間的關係，不過我會做個兩者之間的對話，希望有對兩者的釐清有所助益。

Beck 對於風險的基本定義是「技術經濟發展所不可避免的副產品」(1992: 20)。這把焦點放到了這個歷史過程的曖昧性質，或是兩面性。以 Beck 的話來說，好的工業化過程所帶來的壞的結果，在拉丁美洲是更顯而易見的，因為拉丁美洲擁有大量的自然資源，加速了這個過程，並且帶來了對社會和環境很大的影響。而風險分配的問題也在不平等的結構下變得更加顯著。這個意義來說，Beck 的理論建構了對這個區域的發展的長期視野，貢獻良多。

此外，在歐洲和美國，風險社會總是被解讀成風險是「民主」的，強調酸雨或是車諾堡輻射的危害是不會認人的。可是，其實 Beck 一開始的關懷是在於風險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以其國家內或是國家之間風險的不平等分佈。他討論印度的 Bophal 災害和巴西的 Villa Parisi 的嚴重污染時，他寫道：

即使風險正在進行全世界的平均化，但是我們不能誤以為風險分配就沒有社會不平等的面向。風險位置和階級位置是重疊的，而且是在全球的層次上進行重疊。全球風險社會的無產階級

早在 1930 年，後來成為古巴革命的官方詩人 Nicolás Guillén 寫了一首詩，Sugar Cane：

The black man
beside the cane field.

>>

The yankee
above the cane field.

The land beneath
the cane field.

Blood that is draining away from us!

他是在譴責美國公司在古巴製造糖所帶來的社會和環境破壞。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討論了風險的生產和分配。可是風險的定義也是 Beck 對於拉丁美洲發展過程的認識的另一大貢獻。誰有權力定義風險呢？就是那些控制了「定義的關係」的人，並且掌握權力。在討論「全球風險的不平等」時，Beck 說道：

一個若是想要揭開世界風險和社會不平等的關係，那就必須揭露風險這個概念的法則。風險和社會不平等，風險和權力，這都是一體兩面的。風險預設了決策和決策者，而且生產出了激進的不對稱。這不對稱是介於決策者和受影響者之間的不對稱。決策者做決定，受影響者承擔決定，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 (2014: 115, 強調為原文所有)。

這個情況也可能改變嗎？弱勢有可能被聽見，然後拉丁美洲會克服這個正在進行的新殖民主義嗎？在最後發表的文章中，Beck 宣稱了「世界的後變形構」是正在進行中的，也是「壞影響的好的一面」，這隱含著「在我們想像力外的變化」，而且多數是氣候變遷的結果，以及如改變了我們：「我們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我們思考這個世界的方式，以其我們想像政治的方式」(2015a: 75-76)。

雖然他強調「依賴理論」和「世界主義理論」之間的差異，但也警告說：

後變形構在理論上來說是還沒完成的概念，但也不可能被完成，因為它是開放的，也有可能翻轉。即使權力關係已經被打開，即使有更多的依賴的對稱分配與平等 (的期待)，這意味著世界主義不可以被新帝國主義所工具化嗎？不，不是的。世界主義化不是單向的，所以也有可能強化了既有帝國主義的權力結構。(2015b: 122, 強調為原文所有)

他承認他的「後殖民主義的後變形構」(metamorphosis of postcolonialism) 的概念還沒有完全發展好 (Ibid.: 121)。而他的過世也中斷了這個理論建構計畫。不論如何，在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家和一般民眾將會繼續從 Beck 身上學到東西。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很多書 (像是《Weltrisikogesellschaft》，《Fernliebe》，《with Elisabeth Beck-Gernsheim》，《Das deutsche Europa》) 等都被早於英語翻譯成西班牙語。他是學者也是知識分子，也在公共領域相當活躍，這在拉丁美洲來說特別令人受到尊敬。■

來信寄給 Ana María Vara <amvara@yahoo.com.ar>

References

Beck, U. (1992) [1986]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ck, U. (2014) Ulrich Beck. Pioneer in Cosmopolitan Sociology and Risk Society. London: Springer.

Beck, U. (2015a) “Emancipatory catastrophism: What does it mean to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society?” Current Sociology 63(1): 75-88.

Beck, U. (2015b) “Author’ s reply.” Current Sociology 63(1): 121-125.

> Ulrich Beck

在東亞的影響[1]

by Sang-Jin Ha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南韓, ISA
Research Committee for 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RC47)內部委員

Beck 對於南韓 Sewol 沈船事件有些鼓勵的話：有時候「壞」的事情會有一些「好」的非預期行後果，也就是船難的發生讓大家更重視了政府的不負責任這個議題。

公共的注意是由論述地景和歷史社會過程所形塑的。Ulrich Beck 在東亞—特別是南韓、日本、中國—的影響可以透過討論這個地區的問題、可能來被闡述。而討論也不只限於風險的認知，還包括了對於未來的敏感度。

東亞代表了世界上在戰後最成功的現代化典範，這是一個被壓縮的現代化，讓人民有了驕傲和自信。可是非預期的結果來自於快速的現代化、官僚化、威權發展國家，深深影響人民生活。結果就是伴隨而來的致命風險，把光明的現代化帶到了黑暗的一面。

東亞的規範性傳統，像是儒家文化、道教、佛教等，在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影響下還是屹立不搖。這些傳統藉由關注資本主義全球話帶來的風險議題，使得原本保守的它們成為了批判風險社會的論述來源，因為風險社會危害了人類尊嚴、共生、人本的精神。

Beck 在這的地區的受歡迎程度有三個明顯的原因。首先，Beck 的風險社會概念非常真實，特別是日本的福島核災 (2011)，韓國的世越號沈船事件 (2014)，或是北京的沙塵暴。第二，除了風險，Beck 也提供了新的未來願景：反身現代性或是第二現代性。這個視野對於東亞追尋自我認同和未來有很大的啟發，因為這不只是複製西方現代行而已。第三，Beck 對於參與風險治理的倡議也很重要，這和以往的傳統國家治理和科學官僚模式大大不同。

Beck 在 2014 年的 7 月訪問 Seoul 顯示了他的公眾知名度和影響力。這個國家仍然還在世越號的四月事件的陰影之中。政府對於罹難者 (包括上百人，還有年輕的學生) 救助的無能讓公共的憤怒被點燃了。Beck 在韓國媒體中心的國際會議廳有一場演講，座無虛席，雖然主題是環境變遷，但是 Beck 也說了一些安慰的話，認為民眾的憤怒可以轉化為改變的動能。因為「壞」的事情可能會有非預期的「好」的影響。他並說，這個事件可以讓大家更注意政府的不負責任。

後來 Beck 加入了 Seoul 的 Megacity Think Tank Alliance (MeTTA) 的論壇，主題是「超越風險、邁向安全」。在於

>>

Seoul 市政府直播的電視上，Beck 強調了新政治的重要：

東亞所面臨的問題已經很明顯了。國家彼此連結，但是有著歷史的糾結。若他們沒有辦法成立一個亞洲聯盟，那其實沒有理由為什麼這件事情不能由城市來做。像 Seoul 這樣的城市可以一起成為「城市聯邦」，而非國家聯盟。城市可以成為世界主義的，並且全球的，這就是城市合作的第一步。

Beck 突然的過世震驚的整個南韓社會。保守和自由派的媒體都哀悼他。Seoul 的市長 Park

Won-Soon 延長了追思會，說：「我會努力讓 Seoul 成為一個模範城市，可以克服 Beck 教授所警告的各種風險，並且透過市民參與和都市合作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標。」韓國大學 Kim Mun-Jo 教授寫了一篇訃聞給 The Joongang Ilbo。而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的 Hong Chan Sook 教授也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給 The

Kyunghang Shinmun 紀念 Beck。她說道在 Munich 的經驗：「他總是提供幫忙和溫暖給他的學生，特別是那些遠從東方而來的學生。」

在 The Hankyoreh 中，我描述 Beck 是一位我遇過的西方學者中最溫暖且熱情的一位。在 Park 市長的要求之下，Beck 同意執行一個「Seoul 計畫」，是一個參與式風險治理計畫，預定在 2015 年 1 月開始。而 12 月 22 日他還在 Skype 中表達了對這個計畫的熱情期待。他甚至提出了「東亞風險行動者議會」的概念，這是從 Bruno Latour 借來的點子，在 Paris 的一場會議之後被提出。今年 3 月，當 Seoul 計畫開始執行的時候，知名的僧侶 Ven. Myoung Jin 主持了追思 Beck 的儀式。Beck 夫婦和他在 2008 年訪問 Seoul 時見過面。

在日本，Beck 首先在環境社會學被重視。然後在 2000 年代早期，他的個體化概念越來越受歡迎。但是 Beck 在福島核電廠事故之後特別重要。在 2011 年的一個訪談中，他解釋了風險的本質，但是也鼓勵日本民眾要參與去防止工業和專業對於技術決定的壟斷。

Beck 風險社會理論在日本的影響類似於車諾比核電廠爆炸案之後對於世界的影響。日本在事件之後的主要報紙：Asahi Shimbun, Nihon Keizai Shimbun, Mainichi Shimbun, Yomuiri Shimbun, Sankei Shimbun 等都有報導他的貢獻。Beck 的好友 Munenori Suzuki (於 Hosei University) 描述 Beck 市一個心胸寬大的知識分子。」

Beck 或許對於中國民眾來說陌生了一點，但是在中國的學術界卻是很熟悉的。至少有 8000 篇中國的期刊文章提到了 Beck 和風險社會。儘管對於一般中國大眾來說 Beck 不是太熟悉，可是主要的報紙和媒體也都報導了 Beck 的過世消息。文匯報用了一整個篇幅的報導：「Beck 的風險社會理論 4 個關鍵字」之中，復旦大學的孫國東教授摘要了 Beck 的理論；「第二現代性、反身行、次政治、世界主義」。而清華大學的吳強教授也寫了一篇文章到新世紀雜誌。許多學術界人士也到微博上面發文紀念 Beck，就像在日本和南韓一樣，Ulrich Beck 的過世消息在中國也有許多人哀悼。■

來信寄給 Sang-Jin Han
<hansjin@snu.ac.kr>

註 1：作者想要感謝 Sae-Seul Park, Midori Ito, Mikako Suzuki, Yulin Chen, Zhifei Mao 等人對於南韓、日本、中國資訊的收集幫忙。

> Ulrich Beck 在北美的多重影響

by Fuyuki Kurasaw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加拿大,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ological Theory (RC16)內部委員

Beck在2014年的日本橫濱世界大會。

Ulrich Beck 對於世界主義的信念是重要的，雖然他沒有特別理論化這個問題，但是他是個世界主義者。或許這讓一個日本 - 法國 - 加拿大的社會學家撰文來紀念是適合的。我之前對於 Beck 的作品就很熟悉，不過要到了 2005 年左右他來到 Toronto 的時候我才第一次見到他。我記得他對於這個城市擁抱現代主義建築的高度驚奇，特別是芬蘭建築師 Viljo Revell 所設計的 City Hall，而他對於族群文化的多元主意也感到興趣，Toronto 是世界上數一數二適合研究這個問題的地方。當然，這些主題也都是 Beck 的中心關懷，所以我們談論和走在路上的時候，對他來說，反身現代性和世界主義都是實際的日常生活問題。

要評價 Beck 在北美的影響，我想我們需要區分三個北美的社會學邊界。首先他最有影響力的可能是法語區的魁北克社會學。不意外的是，Beck 的歐洲思考與歷史淵源，許多他的概念都是魁北克社會學家的參照點，因為這些社會學家也都運用像是風險社會或是反身現代性的概念在關於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著作之中 (Michel Freitag, Joseph Yvon Thériault)、個體化的作品 (Daniel Dagenais), 以及 Beck 對於世界主義在泛北美的跨文化實踐 (Jean-François Côté)。事實上，魁北克社會學期刊 Sociologie et

Sociétés 有一期就是特別討論世界主義，主要就是用 Beck 的作品作為起點。

第二個北美社會學社群就是英語區的加拿大社會學。這比較像是介於歐洲和美國的社會學傳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和 Beck 的作品有所互動。雖然比起魁北克社會學，英語社群的程度比較少，但是他的作品還是可以在 3 個次領域中看見：監控社會學 (安全管控政府和風險評估。David Lyon, Sean P. Hier, Daniel Béland)；環境社會學 (制度化公共管理在地的風險問題，Harris Ali)；加拿大政治經濟學 (風險僱用，Leah Vosko)。

美國社會學是受到 Beck 影響最少的地方。當我們比較 Beck 的影響力在歐洲、亞洲、南美洲 (見本期全球對話文章)，美國例外主義特別明顯。或許用美國的經驗主義和歐洲的理論主義來解釋是合理的，

>>

但是有更多其他的因素。從制度的角度來看，Beck 沒有美國的何作者讓他的概念可以在美國社群內流通 (Michigan, Wisconsin, Chicago, Berkeley, Harva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此外，Beck 不長撰寫分析性的文章，比較傾向寫短文，並且透過這樣的方可以快速回應變遷快速的學術界。所以，他的概念不是可以馬上被研究所操作化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來，他在美國的低能見度和 Zygmunt Bauman 一樣。這和 Bourdieu 受到歡迎的程度差很多。此外，利用 Burawoy 的分類，Beck 是個公共社會學家，所以和美國以專業社會學為主流的架構不太相容。所以他最近對於 Angela Merkel 的批判 (Merkiavelli) 在美國是沒有什麼人知道的，不過他的公共實踐模式在美國已有其他的公共或政策社會學家是持續在訴求的 (Burawoy, Orlando Patterson, Michèle Lamont)。

同一時間，Beck 的影響可以在一些美國社會學的次領域中看到，包括 Jeffrey C. Alexander, Craig Calhoun, 和 SaskiaSassen。他們都和 Beck 的作品有所對話，而風險社會的概念也變成美國環境社會學的主要概念，也是 STS 的核心概念之一 (特別是那些研究組織管例和政策風險的人)。有趣的是，Beck 的方法論世界主義訴求也被美國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分析所注意，還有世界體系理論家、比較歷史社會學研究文明化和帝國的學者，多場域的民族誌學者，政治社會學家等等也有注意到。

關於 Beck 的貢獻，我想我可以用四個研究主題來說營。第一是全球風險的快速循環所帶來的社會與政治意含。這包括了理解高度選擇的過程，而組織在象徵上頷政治上也包括了許多風險，像是恐怖主義，並且忽略其他的風險，像是貧窮和結構暴力。第二，我們應該定位全球社會力量的影響，不論分析的層次為何，都要問題化「社會」這個客觀研究的對象。第三，我們應該試著去釐清行動者和制度的功能，特是那些傾向平等和多元文化的集體計畫，對世界主義的包容等，可是也要理解反世界主義。第四，我們應該發展出種資料收集和方法的工具，不要把國家當作分析的預設單位，以及為了比較超民族國家和次民族國家的現象、行動者、制度，這個努力更加需要被重視。Beck 的確有這樣的研究議程和架構。

上一次我見到 Beck 是在 2014 年的 12 月，那時候我是參加一個 Paris 的工作坊，關於世界主義的資料和研究方法。他談到他的書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World 時，充滿熱情與活力。他把這本書當作是里程碑的作品，論證一個新的社會科學視野，並且可以用來理解這個複雜多變得世界。這是他最後的想法，也是最重要的屬於他的大圖像的知識創意。最後一天的時候，我和一位朋友在一個小餐廳 (bristo) 吃飯，是一種在 Paris 快速消失的餐廳。我要離開的時候，我看到他和他的太太，也是有名的社會學家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走在路上。想必他們也在這邊用餐吧。我看著他們鶼鰈情深的在夜晚的 Paris 手牽手，在夜晚的 Paris。這就是我最後的印象。他的過世，不但是社會學界，也是整個社會科學界的一大損失。

來信寄給 Fuyuki Kurasawa <kurasawa@yorku.ca>

> 愛爾蘭邁向經濟危機的路徑

by Seán Ó Ria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愛爾蘭

1990 年代，愛爾蘭被世界認為是成長快速的「Celtic 老虎」。大量的出口和外國投資總是報紙頭條的焦點，但是真實的故事是大量的失業和人口外移。1990 年代起飛的尾聲，愛爾蘭社會有令人無法想像的資源，包括經濟、制度、文化。愛爾蘭經濟穩定下來了，發展足夠了，而 1980 年代所留下的債也還清了。

2008 年之前，那些資源彷彿煙消雲散了，伴隨金融危機一起消失無蹤。1990 年代的自由全球經濟在最肆無忌憚的時候被轉變成謹慎的資本主義小尾巴。

什麼造成了這樣的轉變？現代資本主義的三個要素：金融化、國際整合、自由貿易政策，三者交織在一起，導致了愛爾蘭的危機。第一，1990 年代的起飛是以製造業投資為基礎，並透過發展主義國家支持新工業而得以可能，可是 2000 年之後卻看到資產的投機操作，隨著廉價的信用和炒作居住和辦公建築的市場，產生了房地產泡沫。最後，這也導致了銀行破產，銀行債務被轉嫁到公眾身上。

第二，愛爾蘭的金融化已經到達危險的高峰了，藉由改變歐洲整合的動態而更加危險。1990 年代，歐洲的公共基金支持了高比例的愛爾蘭投資；2000 年代，私人借貸的大量流入籠罩了整個經濟體，愛爾蘭銀行變成大量欠債給國際銀行。政策方面，歐盟推動金融整合，包括歐元整合貨幣的實行，甚至許多國家政府和歐盟委員會減低了社會和資本的投資。當歐洲大量投資給未來，結果就是投機。

第三，愛爾蘭的政治幫助了國際金融化的壓力轉進到國內的危機。90 年代末期的政府結合了民粹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這種危險的混合體取消了所有的稅，變成更依賴資產利得稅，好因應支出的增加。當信用和房地產泡沫在 2008 爆發之後，愛爾蘭的公共基金留下了一個大洞，而為了回應這個危機，政府馬上增稅，減少支出。

愛爾蘭的故事提供了幾個重要的課題，這些課題事實上是關於所謂的經濟自由主義。這個概念總是和北美的自由資本主義放在一起，而愛爾蘭資經驗某些方面也是類似的。為了增加投資而減少資本利得稅和減稅的作法，依賴於股票市場去提供檢查，堅持輕微的銀行管制和限制國家去取得銀行活動的資訊，所有這樣市場機制都導致了愛爾蘭的災難的發生。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高度集中化的政府系統讓幾個部門有很大的權力，所以限縮了看待經濟的視野，減弱民主治理。導致投機泡沫的財務政策和削減稅基是後來撙節的原因。注重在現金支付而非公共服務的福利國家侵蝕了公眾對於保護社會服務的支持。所有這樣都是政治的因素，並且影響深遠。但是每一個都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特徵。北美自由經濟傾向擁有更層級化的公共和私人組織，並且給予政黨更多的權力。他們傾向預算赤字，強調所得的利益而非公共服務。這些特徵或許不是市場的面向，可是卻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普遍特徵，並且是自由主義的共同元素。

這場危機的 6 年多之後，愛爾蘭的經濟現在很脆弱，而且復甦得不平均。特別是就業提高了，稅收提高了，而且預算赤字減少了。但是，愛爾蘭向前進的能力被之前所提到的三個潮流所威脅著。雖然銀行沒有像以前一樣隨便借貸，但是卻提供了更少的信用給企業，政府也成立了長期保證的國家投資銀行。金融和資產都成長了，所以提高的租金和價格給予了家庭和中小企業不小的壓力。

隨著這個浮現的再次金融化，歐元區的政策回應很不適當。或許歐盟領導者的撙節政策並不令人驚訝，歐洲的社會民主國家歷史上也不喜歡預算赤字和國際金融市場。可是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國家持續拒絕平衡支出削減和投資計畫去刺激成長與增進社會福祉。現在的投資

>>

計畫透過公共部門，在新的「量化寬鬆」下是不被重視的。錢都進了私部門的口袋。

最後，愛爾蘭的現在政府急著想要減稅，這種受到歡迎的政策並不令人意外。可是這帶來了對於反對現有歐盟和愛爾蘭撙節政策之勢力的重大挑戰。相反的，平衡預算還沒有成為歐洲經濟自由派的策略，但已經是社會派的了。他們已經尋找社會團結的可能，制定一個以高就業、強大社會服務、平等工資為基礎的社會契約。這些都在保護式的金融外殼之內。

「歐洲曾經相當努力投資未來，
但是現在只用想的而已」

愛爾蘭和歐洲的方式強調不只在外殼，還包括了極少的社會保護。重新找回古老的社會民主保護措施，包括審慎、保護、經濟社會的生產活動等，這是長期被歐盟政策辯論所忽視的，也已經過期很久了。■

來信寄給 Seán Ó Riain <Sean.ORiain@nuim.ie>

> 保衛公共領域

by Mary P. Corcor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愛爾蘭

新公民社會的象徵：Dublin郊區的社區農田。Mary Corcoran攝影。

自由民主國家的公共領域，像是公共的資源、服務、教育、媒體等等，在愛爾蘭看到了衰退的跡象。在同一時間，我稱之為夾縫中的公共領域則正在興起，也就是那些一般來說看不見的活動。這特別是在撙節政策之後產生的。我想是有可能去視覺化這樣的現象，以其描述這樣的夾縫公共領域怎麼傳播到制度性的公共領域，迫使市場、國家、公民社會的關係重新平衡。

正式公共領域已經撤退許久了，包括資源的撤除和批評的聲浪。這是30年來私人影響和公共揮霍的結果(借用J.K. Galbraith的話)。健康服務的提供者，教育者、公共服務提供者都是私人部門、政治人物、媒體等所批評的一部分。Anthony Cawley對於媒體描述公共領域之框架的分析指出，公共領域被連結到「浪費」、「負擔」、「支出」等概念上，而私人領域總是和「投資」、「財富創造」等連結在一起。這些連結幾乎已經被內化了。

而在邁向經濟危機的那幾年裡面，愛爾蘭重新結構化了金融和市場體系。這並不只是因為公共財和服務已經被侵蝕了。公共知識分子覺得越來越困難去構築一個批判的空間。有修人已經宣稱公共知識分子不夠努力，

>>

對於市場基本教義派不夠批判。這些知識分子覺得好像只是技術官僚的附屬品，聲音都不被注意和聽見。

在天主教的巨大影響之下的技術官僚的政府相比，公民社會只有很孱弱的力量，至少和其他的歐洲社會比較起來是如此。愛爾蘭在國家之外有力的機構很少，所以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會相對少。

可是，危機也可以是轉機。愛爾蘭已經歷經經濟衰退、政治揮發、社會心理的年代。我們「失去了藍圖」以及「失去了我們自己」，還以失去經濟的主權。可是我們也便得更堅韌和有想像力，因為看到了許多新的小型公共領域。這裡我們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和參與中看到公民社會的生命力和活力。即使只是檢視日常生活的樣貌，夾縫的公共領域顯示出了潛力，這種由下而上，被公民行動和互動所滋養的文化，正在茁壯中。

生產空間，像是都市田園，交換場所，農民市集等也正在都市中展開，挑戰了大眾消費的模式，重新連結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讓環境永續的議題被看見。公共圖書館也扮演了21世紀公共領域中的重要角色，鑲嵌在在地文化中，提供服務給移民或是居民。一位資深的警察認為在Dublin最有整合性的空間就是新的West Dublin圖書館。

此外，有也許多以活動為基礎的空間幫助活化了公共領域。像是年度的游泳、馬拉松、公共沐浴等，也都是對所有人開放，提供機會給人們自我展演。700多個活動有賴於大眾的志願幫忙，在地的支持，提供藝術、食物、歷史、音樂、文化、詩歌等的資源！

夾縫的空間也包括了臨時藝術走廊、商店、表演等等，這樣即興創作的模式讓公共領域活化了，讓我們重新檢視我們許多的預設。虛擬的空間也透過電腦和網絡通訊媒介得以運作，提供了政治組織的機會，以及創業資金的募集，還有創意公共財的提供。

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是一個志願性的組織，他們尋求建構綠化郊區和通勤鄉鎮的社群，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公共認同的形成上。民主參與的空間包括了多元的創意，像是「構想未來」就是一個公民團體，研究怎麼達到更平等、包容、永續的愛爾蘭國度。Men’s Shed project提供了聚會的場所，讓老人可以聚集、製作手工藝、享受休閒時光。這些空間都構成了公民社會的活力和愛爾蘭公共領域的基礎，由下而上，讓公民知道除了經濟之外還有其他的公共生活面向。這也是社會。因為這樣的夾縫公共領域的擴散，可以重新掌握制度的公共領域，並且成為更新這個共和國計畫的一部分。■

來信寄給Mary Corcoran <Mary.Corcoran@nuim.ie>

> 愛爾蘭的女性運動

by Pauline Culle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愛爾蘭

第一波的愛爾蘭女性運動包括了Cumann na mBan：女性的共和議會組織，在1916年的Easter Uprising中對抗英國統治。

愛爾蘭有著很長的父權歷史，但是也有持續發展的女性運動。今天複雜和跨國的女性主義可以在殖民時期找到其先行者。第一波的愛爾蘭女性主義運動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以其1918的女性投票權設立，那時還是英國殖民時代。第一波的女性主義運動在民族運動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的要求被擱置一旁，特別是在保守的天主要後殖民時代的國家建立時期。在1970年代，第二波的女性主義標示了一個重要的激進與鞏固的轉折點，在對抗施加於女性的暴力和生產權上面，大有斬獲。相反的是，1980年代，正值社會保守主義高漲，高失業率，人民出走，這是對女性運動的反動。憲法禁止離婚和墮胎。

而1990年代則帶來了女性主義的行動風潮，特別是女性主義的去中心化和分裂化，成為了網絡和地方的社群與自願群體。然而，離婚的合法化，同志的去歧視，以及越來越多女性勞動力參與，這些都是女性運動發揮作用的證明。在這段期

>>

間，女性主義者成功地公開檢視取多污名的議題，並且保障了了國家對於平等，避孕，資助女性社會服務等的支持。在1990年代則是生產權的立法，透過歐洲法庭得以成功，不過結果是有待評估的。這個第三波的女性運動越來越專業化，並且成為了國家女性主義的主流。

最近，為了回應經濟危機，Catholic Right的運動復甦了，然後國家領導的撙節政策和新的團體也出現。愛爾蘭女性主義網絡(IFN)成立於2010年，目標是去動員年輕女性。Pro-choice的團體繼續動員支持生產權，這是持續影響了好幾世代女性主義的議題。而經濟危機也影響到了女性的集體資源和能動性，這我們在許多的性別平等單位和公共服務的資金縮減可以看到。顯然，撙節政策傷害了性別平等的基礎，但是也有很強的女性運動動員反對這個潮流，包括了許多的抗議活動。

雖然全球化的力量，像是經濟蕭條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毫無疑問地對於女性主義運動有所影響，可是國際的力量對於愛爾蘭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仍然是一個有待辯論的議題。許多學者看到了女性主義運動本土發展的一面，而其他學者則看到了國際影響的一面。歐盟則是愛爾蘭關於性別平等辯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對於歐盟現代化影響離婚和墮胎的保守反動興起，可是歐盟的性別平等和人權法庭的努力也開啟了女性主義倡議平等的機會大門。另外一方面，的確，愛爾蘭國內的女性主義運動也至關重要。愛爾蘭性別平等政策的歐洲化和和顯著的進步也透過抗議、遊說、立法等達成。2014年有超過30個性別平等的立法通過，都和歐盟有關。而歐盟也提供了這些團體機會去跨國合作，形成泛歐的女性團體網絡，像是European Women’s Lobby。

可是，歐盟並不是性別平等的萬靈丹。愛爾蘭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還是存在，在歐盟的層次，性別平等仍然是在工資的議題上。或許可以說，歐盟對於愛爾蘭性別平等的支持較過去少了，因為在國家和歐盟的層次，去歧視的努力已經相當普片。相同地，新自由主義對於個體權利的重視和組織效率也提供了不少的支援，減少了不平等，可是也為女性帶來了新的問題。女性「人力資本」的提昇和勞動參與的增加被認為是成功的進步，可是社會生產、照顧、結構化歧視，權力不平等還是一樣，並沒有改變。

在歐盟之外，愛爾蘭的女性運動一直以來想要透過聯合國對政府施壓，包括了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和北京綱領。2014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的報告指出愛爾蘭需要更強大的性別平等與女性參與的努力。

愛爾蘭在政治、經濟、公共領域的代表性還是很低，這些包括了年長的政治和經濟領導者，這需要徹底改變我們這個父權文化的結構。愛爾蘭的女性主義運動是複雜、不同的。但是他們可以投身到各個領域，無論是社會、文化、政治。也在不同的層次發生影響力，像是地方、全國、跨國的層次。女性運動即使複雜，但是仍然對於實現性別平等來說，是重要的。■

來信寄給Pauline Cullen <Pauline.Cullen@nuim.ie>

> Celtic 連結

愛爾蘭的全球家庭

by Rebecca Chiyoko King-O'Ria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愛爾蘭

愛爾蘭充滿了全球化的愛。

愛爾蘭過去有許多人民出走，但是現在卻是一個全球化的國度，特別是 90 年代和 2000 年之後的移民潮。和許多人的期待相反的是，並非所有的移民在 2008 的經濟危機時期回到家鄉波蘭或是其他國家，反之，許多人留下來了，組成家庭，特別是高教育的人口，帶來了全球化的經驗，非愛爾蘭的配偶，小孩，網絡。所有這樣都讓愛爾蘭逐漸成為了全球化中心。

2011 年之前，愛爾蘭的人口普查顯示有 17% 的人口非出生在愛爾蘭。這相較於 2006 年成長了 25%。而 2011 年的數據也顯示有 12% 沒有愛爾蘭國籍。雖然也有 85% 的人口是白人和愛爾蘭籍，2006 到 2011 年其也有 87% 人口成長，包括非中國的亞裔人口 (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主要都在 40 歲以下。而超過 50 萬的人口 (514,068/4.5 百萬) 說外語，而最多的是波蘭，再來法語、立陶宛語、德語。在這些人口結構變化的上層，科技也讓跨國的實踐成為可能。寬頻和無限網絡的普及率讓 81% 的人口可以上網 (2012)，而在 2008 年只有 61%。

這些頻繁的接觸和跨國的親密關係增加意味著什麼呢？

家庭—各種形式的家庭—現在正在各種制度的交會口，形塑著整個愛情和親密關係的文化理解，決定了親密關係的合理形式。這些理解通常透過情感行為的劇碼而產生，而這些跨國的家庭和情感實踐也成為愛爾蘭日常生活的核心。我們從 2011 年的普查可以知道有許多混合或非愛爾蘭的家庭存在。這可能是包括了出生在愛爾蘭的小孩和其奈及利亞的移民父母住在一起，也可能是其他國籍的家庭組成。有些

>>

族群特別會組成這種混合家庭，包括美國 (72%)、英國 (64%)、奈及利亞 (77%)。

而隨著增加的族群多元、混合家庭、家庭型態的多元，愛爾蘭經歷了家庭為基礎的多元文化變遷，也是 Ulrich Beck 所說的全球家庭。這些家庭通常是多族群、多文化、多信仰、多語的，透過網路媒介和愛爾蘭以外的世界進行連結。29% 的愛爾蘭網路使用者於 2012 年的調查中顯示用過視訊會議來維護情感和社會的支持。

而這樣的多元全球家庭怎麼和愛爾蘭以外的世界進行連結呢？如上面已經提到過了，主要的連結並不是經濟為基礎的，而是情感和文化，透過資訊科技來維繫。像是 Skype 等的軟體可以讓愛爾蘭的家庭進行跨國連結，超越地理的限制。這也形塑了人們如何利用科技進行情感維繫的方式。Elliot 和 Urry 認為科技的使用讓人們把情感「儲存」到科技之中，然後再「提款」出來。「個體可以被看作是在進行情感銀行的處理，先把情感、情緒儲存起來，往後再拿出來進行處理」(Elliott and Urry, *Mobile Lives*, 2010: 39)。如情感銀行的概念，我也稱之為「情緒串流」，亦即透過資訊科技來溝通傳遞情感。

Skype 視訊不只是有聲音和影像的溝通媒介、人們坐在電腦前面視訊這樣而已，它更像是「串流」許多影片和影像，然後透過「視窗」去捕捉串流的當下，把日常生活的雜訊和混亂都記錄下來，不是只有幾分鐘而已，而是幾小時。透過每日的視訊，有時可能是好幾天，將彼此的社會關係穩定下來，創造一種情感連帶，超越時空的限制。這種情感互動讓長距離的互動成為可能。

愛爾蘭的家庭變遷不只是人口組成上的變化，還是地理限制的超越。有了科技，愛爾蘭的家庭生活有了改變，越來越多人可以進行全球化連結，並維繫情感和親密關係。■

來信寄給 Rebecca King-O' Riain <Rebecca.king-oriain@nuim.ie>